

以狂欢之名,一切皆有可能

——读亚马多《金卡斯的两次死亡》

■ 谷立立



《金卡斯的两次死亡》
[巴西]若热·亚马多著
樊星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谈到巴西,很难不会想到狂欢。长久以来,这个民族骨子里散发出的癫狂意识,让庸常人生也带着一丝不凡。生活如此,文学也不例外。作家借狂欢之名,大发荒诞之语,以魔幻的手法无限贴近他的国家、同胞,从而完成了一种狂欢式的写作。若热·亚马多被誉为巴西“国民作家”,想必对此种创作不会陌生。从1930年创作《狂欢节之国》到1992年的《土耳其人的美洲大发现》,他以诗歌、散文的笔法细腻描绘巴西社会风情画,笔下作品几乎可为当代巴西代言。

不可否认,《金卡斯的两次死亡》有一个卡夫卡式的开头。小说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主人公金卡斯的人生走到了尽头。别急,这可不是盖棺定论。细读小说,我们很难找到一丝半点的悲戚,扑面而来的反倒是实实在在的狂欢。换言之,死亡真实存在,狂欢真实存在;死是生的隐喻,生是死的载体,两者互为依托、彼此照应,最终烘托出一种闹剧化的死亡场景。没错,闹剧。亚马多擅长营造双面人生,《金卡斯的两次死亡》尤其如此:金卡斯不仅拥有两种死法,还有两种活法。他曾是安分守己的公务员,是完美无缺的正直公民。可谁知他放弃国税局令

人艳羡的职位,选择与“堕落”相伴,终日嗜酒如命、流连赌场、混迹街巷,令家人蒙羞、为世人不齿。如此这般任性胡来,倒也罢了,可是死亡偏偏不请自来。于是,如何才能抛开劣迹、恰如其分地评价金卡斯,就成了摆在有关人士面前的最大难题。

金卡斯的死亡与其说是人畜无害的私人事件,倒不如说是透射人性的公共话题、癫狂人生的终极汇演。小说中,道貌岸然的中产阶级齐聚一堂,站在各自的立场对金卡斯不甚体面的死法做出大体相似的表现:有的极力掩饰,有的难以理解,有的羞愧难当;正

派的老友将金卡斯的死期当作新生,今生丑闻连连,来世或能安然;笃信宗教的女儿万达深以父亲为耻,“这个爸爸就是十字架,将他们的生活变成了骷髅地”;一脸严肃的女婿列奥纳多不去想如何让岳父风光大葬,一心想着自己添置一双新鞋……

读到这里,是不是觉得眼熟?是的,荒诞。或许,还应该加上魔幻。整个拉美都是魔幻集散地,巴西如何能独善其身?至少在亚马多这里,魔幻不是没有,而是太多,多得早已渗透到民族血脉当中。比如死亡,小说标题明明白白地预告了金卡斯之死,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但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怎么可能死两次?或者说,死神如何不露痕迹地将之扮成玩笑,在众人把葬礼当成炫耀身份、展示财富的盛大派对的当儿,给了金卡斯一个合乎身份的结局?

然而,这不正是我们一直苦苦寻觅的魔幻吗?正常的人生固然不会有两次死法,但若是顶着“狂欢”的名号,一切就皆有可能。亚马多不愧为讲故事的高手,他轻轻一笔宕开,一生二,二生三,将一个人、两种活法、两次死亡,延展成一个家族的双重狂欢。儿女的安排是其一,酒徒的唤醒是其二;前者体面且高尚,后者草根

接地气。很难说两种死亡孰优孰劣,因为它们都是当下巴西的映像:草根铺就地基,世俗(钱财、利益)塑造思想,且在有意无意间左右着人们的判断:中产阶级女儿以虚伪的方式粉饰了父亲的“堕落”,但她却怎么也搞不懂自己的老父亲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

还好,亚马多知晓一切。如他所说,真正的水手不会留恋安稳的床榻。好比路上的行者只配倒在路上,亚马多的水手永远只属于大海。醒过来的金卡斯还来不及享受他虚假的荣光,就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完结——我们只见他轻轻一跃,心满意足地跳入大海,随即被海浪吞没。从此,老水手彻底摆脱了乏味的体面,将恼人的名誉、周遭的非议、难缠的儿孙远远抛开,得到了他一心盼望的安宁。

不过,你能说金卡斯不道德吗?至少在亚马多这里,他是不折不扣的英雄。只是,这种英雄性从一开始就与世俗价值相互背离,难免被打上“堕落”的符号。同样,我们也不能说亚马多不道德。因为真正的作家永远游走于道德边缘,拿堕落说事,却不屈从于世俗的约束。亚马多太老练,他老练地戳穿了虚伪的肥皂泡。作为一个数十年如一日描画巴西民族精神内涵的作家,他不仅称职,而且早已超越了他的职责。回到小说,金卡斯究竟应该如何生、应该如何死本来不是问题,问题是从这次因死而生的事件中,我们能够读出些什么:是一团乱麻的民族劣根性,还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狂欢?

“美国梦”的悼文

■ 王 森



《惧恨拉斯维加斯》
[美]亨特·汤普森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经雷译

虽然名曰小说,但《惧恨拉斯维加斯》却与传统小说的写作形式迥然有异——与传统的小说相比,该小说在内容上显得更加离经叛道,它讲述的是一场两个人的荒诞之旅:时间,是一个前所未见的周末;地点,是赌城拉斯维加斯;故事——如果还能称作故事的话,则是一连串荒唐无稽、令人哑然的事件。“一个星期六的夜晚,驾车行驶在拉斯维加斯的大街上,两个好小伙坐在一辆火苹果色敞篷车里……恍惚、碎裂、扭曲着……”他们所为何来?虽然名曰“采访”,其实并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两个人只是游荡于拉斯维加斯的大街与小巷、宾馆与赌场之间,只是一味地狂饮滥赌、醉生梦死。他们或者恶作剧一般做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或者一路飙车嘶吼着穿过沙漠……总而言之,他们追求的是一种眩晕、战栗的快感,就是变着法子把骇人听闻的行为推向极致。

与他们荒唐无稽的行为相对应的,是赌城拉斯维加斯的庸常生活:四平八稳过日子的居民,乱七八糟却又千篇一律的声音,“汽车、喇叭、脚步……根本放松不下来。而小说主人公,与其说追求的是一种眩晕、战栗的快感,不如说是在寻找一种必定战胜陈旧秩序与邪恶势力的感觉。他们之所以“专挑让这帮狗东西最恼火的事做”,绝不仅仅只是为了挑战权威,同时也是要对国民性格中的一切正确和真实的东西进行重新验证,要对美国生活变化万千的多元可能性做一次最直接、最粗野的致敬。汤普森虽然的确常常处于谵妄的状态之中,但他的写作却并没有失控,他的创作意图、他想说的话,最终通过这些“胡言乱语”表露出来。

对于美国来说,上世纪六十年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汤普森在小说中所刻意渲染的,其实正是那个年代的流风余韵。诚如汤普森本人所说的那样,《惧恨拉斯维加斯》是“写给六十年代毒品文化的一篇粗鄙的悼文”。虽然小说写的是暴力、毒品与愤世嫉俗,其中却蕴藏着整整一代人的梦想与追求。尽管他们的梦想与追求均以失败而告终,但汤普森的小说却依然为那个时代留下了一个鲜明的印记。

灵魂逸出常轨的时刻

——读施塔姆《我们飞》

■ 黄 夏



《我们飞》
[瑞士]彼得·施塔姆著
苏晓琴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瑞士作家彼得·施塔姆的创作格局并不是很大。其长篇小说《阿格尼丝》(1998)、《如此一天》(2006)、《七年》(2009)等均聚焦于刻画当代瑞士人的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初读颇有点波澜不惊的小资情调。但施塔姆的创作风格却十分独特,承其早年在大学修习心理学和精神病理学的经历,那些波澜不惊的题材总能在叙事构思和视角上别有令人拍案的地方。这是施塔姆文学形式与内容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

短篇小说集《我们飞》(2008)也不例外,施塔姆依然挖掘着普通人日常生活中不太普通、不太日常的那一面。如果打个比方的话,施塔姆的故事就是往池塘里扔石头,作家关注的并非石头本身,而是石头所激起的涟漪的强弱、波纹、时长及其此起彼伏的样貌。施塔姆重点描写的便是灵魂于焉逸出现实常轨的那一刻,或许是发烧,或许是做梦,或许是失常,又或许是中魔。

《受伤》中,失恋的“我”烧书、弃车、拆床,就差抡起斧头砍向拐跑女友的那个瘪三,直至乘

上火车远离是非地,才摆脱了这疯魔般的处境。《我们飞》中,幼儿园教师安格莉卡将未被父母及时接走的孩子带回家,她通过孩子的眼光看到自己的人生竟是如此不堪——房间又小又脏,工作又苦又没钱,男友上她这儿不过是来蹭饭和上床——她陷入了人生第一次重大幻灭。《诊断书》中,酒店门卫布鲁诺预料将拿到凶多吉少的体检诊断书,琢磨着该怎么回家告诉妻子,更糟糕的是,他眼中的世界渐渐灰暗、扭曲和变形……他们中有些人得以从发烧(做梦、失常、中魔)模式中摆脱,有些人却沉溺其中不得而出,还有些人则悬置于将出不出、取舍两难的境地,就像那个突然看清自己生活的幼儿园教师。

沉溺与清醒的心理状态,及其在色度上的浓淡深浅,正是施塔姆真正想要捕捉和刻画的东西。至于那些将人物置入“发烧”模式的肇因,诸如丈夫出轨、小孩子遭遇童年创伤,抑或中年妇女爱上小鲜肉之类的狗血剧情,施塔姆是不屑深耕的,它们顶多作

为心理调色板上的背景,稍许点缀一二,施塔姆浓墨重彩赋之以血肉的,是肇因引起的心理颤动。这颤动时而表现为推进《期待》故事发展的“药引”。中年妇女与年轻男邻居陷入爱河。“药引”在女人这端越燃越旺,在年轻情人那端却慢慢失效了。起效与失效的分界线,是这篇小说最能引起读者注意也是最难琢磨透彻的地方。而到《三姊妹》,这颤动则表现为某种强烈的受虐情结。海蒂在艺考当日对自己初萌的同性恋意识和艺术才能发生怀疑,她自暴自弃,任由一个后来做了她丈

夫的男人玩弄和蹂躏。我们也许会谴责这个男人乘人之危,但真相是“是她在利用他”,利用他来惩罚自己的怯懦。在一步步禁锢、窒息、消灭自身的同时,海蒂成了一个灵魂空虚、铁石心肠的妻子和母亲。除了描写人们堕入发烧(做梦、失常、中魔)模式的时间和程度之外,施塔姆还强调了“堕入”的不可抗拒性,即使理智都很难将之拔除。《异物》中,岩洞探险家克里斯托夫其实已经对探险的危险性暗生恐惧,但当某个号称岩洞探险同好的男人发出邀约时,他还是鬼使神差地允诺了。尤其是,这个邀约是该男人当着他的女友的面提出来的。原始本能,尤其是性本能令克里斯托夫掉入了这个诡异的模式……

施塔姆的文字冷静、克制、疏离,叙事兼有雷蒙德·卡佛的简洁、亨利·詹姆斯的微妙和詹姆斯·乔伊斯的诗意。他耐心剥离普通人生活的表层,将他们的欲念、激情、理想,和因之而起的大小挫败、反抗和挣扎,表现得纤毫毕现。经此,在道德上他站在一个平视而非俯瞰的角度,对笔下人物、包括那些看上去很不堪入目的人物,皆能给予同情和理解。但这层同情和理解并没有泛滥到使他为这些深陷痛苦情境中的人物寻找出路。与他们不同,彼得·施塔姆始终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